

振兴三大球需要俱乐部扩大基础

——专访日本足协前主席川渊三郎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杨汀

88岁的日本足协前主席川渊三郎曾经成功推动了日本职业足球和篮球联赛的改革，现担任日本顶级联赛协作机构（涉及9个球类项目12个联赛）主席。新华社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请他分享了对于职业联赛以及三大球发展的独到见解。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您眼中理想的职业联赛是什么样的？您是如何把J联赛（足球）的经验运用到B联赛（篮球）的？这些经验也能运用到排球职业化上吗？
川渊三郎（以下简称“川渊”）：首先，足球也好篮球也罢，对顶级联赛来说，如何让更多观众进场观赛是第一位的。我觉得，如何让体育场馆有更多观众对发展联赛是最重要的。不管转播权变得多好，不管有多少赞助商，如果场内观众寥寥，就无法算作成功的联赛。没有现场观众的欢呼，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觉得这是精彩的比赛。因此，我认为现场观众的多少是职业体育最关键的地方，关乎职业体育成功的一切。

其次，联赛和俱乐部做到收支平衡也非常重要。赤字经营不可能长期维持。我对目前世界职业体育的薪酬体系有一些疑问，我认为应该根据俱乐部的成绩和最终收益，拿出一部分来支付球员工资，而不是事先确定年薪。也是基于此，我认为俱乐部要有比较好的营收，否则无法做到可持续发展，实现正向收益是俱乐部也是职业联赛必须做到的。

关于职业体育的经营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打造J联赛的时候，我曾经去英国学习了职业体育的运营。可以说，职业体育经营有三大支柱，一是门票收入，二是赞助商收入，三是转播权收入。此外，还有一些周边商品销售收入。J联赛的电视转播收入大概是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7亿元）。日本足协与赞助商签有赞助协议，得益于巨大的赞助收入，日本足协能够进行健康的运营。各俱乐部的转播权、赞助和门票收入，还有周边商品开发收入的3%会上缴给日本足协。

【注：根据J联赛俱乐部2023财年财报，J1、J2、J3共60家俱乐部的总收入为151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3.9亿元），创历史新高，为上年度的110%。其中，门票收入是上年度的137%，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水平。在上座率方面，J1联赛的平均上座人数为18993人，约为2019财年的92%，J2和J3联赛上座率达到2019财年的96%和125%。】

另一大经验是运用媒体影响力。在B联赛成立前，日本的两大篮球联赛之一叫作BJ联赛，当时其比赛结果很多媒体根本不报道。即使是体育媒体，可能也只报一个结果，没有详细报道。当时，因为无法统一两个联赛，国际篮联取消了日本国家

队参加世界比赛的资格，而这事在日本也没多少人知道，当时篮球在日本的认知度就是如此之低。

2014、2015年的时候，我受各方委托出任日本篮协主席。我去看比赛，现场观众人数大概只有五六百人，球员打得也很差，我都觉得没意思。我想，当时日本篮协聘请曾担任足协主席、建立J联赛的我来担任主席、建立B联赛，可能也是希望我能够搞出各种花样来让联赛被媒体报道、提高篮球的知名度。我觉得就算被认为是爱出风头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为了篮球。因此，当联赛刚成立、举行各种会议的时候，我邀请媒体从头拍到尾，包括对取消企业冠名的激烈争论的部分。以往，这样的会议只有最开始会让媒体拍摄。会议对媒体前所未有的开放之后，我以为会有篇幅很大的报道，结果一看还是只有一小篇，我当时也挺受打击。

建立J联赛的时候，我与当时《读卖新闻》的董事长兼主笔渡边恒雄先生（当时J联赛球队的母公司都不愿意失去冠名权，反对J联赛有关俱乐部命名只能用“地名+爱称”的要求，其中包括东京绿茵队的母公司《读卖新闻》）有过很多的论战，某种意义上让J联赛扩大了影响力。受此启发，我在B联赛建立的时候也希望获得媒体更多的报道和关注，这才把所有的会议和活动都公之于众。而企图依附既得利益的想法和意见也只有通过公开会议公之于众，才会被讨论和批判，才会有反思。当年，正是因为既得利益无法妥协才会造成日本篮球的两大联赛无法合并，从而受到国际篮联制裁。

后来，B联赛成立以后，日本篮球的人气和水平得到了飞跃性发展。去年巴黎奥运会，日本男、女篮都获得了参赛资格。日本女篮在东京奥运会获得银牌后，队长高田真希把银牌挂到我脖子上。她说，本来可能无缘里约奥运会，但最终得以参加并继而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佳绩，非常感谢我，我非常感动。参与篮球改革，以及担任东京奥运村村长等等，我都没有要1日元的工资，我的全心全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总体而言，我认为建立J联赛的经验在建立B联赛时都用上了。比如在体育馆的问题上，我当时认为如果是1000人左右的体育馆，B联赛不可能成功，需要5000人规模的体育馆。如果没有搞J联赛的成功经验，我这么说不会有人相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觉得在排球职业化的问题上，首要问题也是如何提高入场观众人数。

记：中国的足球和篮球职业联赛商业化都有比较快的推进，但近年来国家队成绩却有所下降，有人认为这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对此您如何看待？
川渊：关于商业化与比赛成绩的问

题，我认为商业化不应仅仅体现在球员的薪酬上。我认为中国的球员缺乏“饥饿精神”，不用非常拼搏，不用想到海外去踢球（打球），在国内也能挣到很好的薪水。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并不是说薪水高就是件坏事。我在中超联赛成立的时候去中国考察，曾经跟很多人说过，如果亚洲有能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那首先应该就是中国。这话我说过很多次，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人才选择面非常大，好的苗子非常多，但是要看怎样将这些人才统筹起来。

记：原苏宁俱乐部在2020年中超夺冠后解散，您怎么看待职业俱乐部与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关联？发展职业联赛和提高经济水平的关系？

川渊：J联赛是扎根于地方，以地区、社区为基础的，这与在日本非常发达的职业棒球不一样，后者具有更强的娱乐性和商业色彩。J联赛为了确保俱乐部的稳健经营，会将实际到场观众人数公布到个位数，而职业棒球则总是模糊地宣布“东京巨蛋满座”等等。我曾无数次向媒体解释这种差异及原因，也确实感到J联赛扎根地方的理念在不断深入人心。

以曾在五年内四次夺得J联赛冠军的川崎前锋为例，川崎原本是工业区，给人的印象就是“郊外”，污染比较重。原本那里有一支职业棒球队，后来也离开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职业体育很难在川崎生根。但是，川崎政府当时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要在川崎建立一个职业球队。出于这种想法，川崎市政府等各方面都动员起来，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川崎前锋俱乐部的部门。川崎市政府当时认为，这是为了川崎市民而做的一件事，把川崎市和川崎前锋的发展视作一种双赢的关系。比如，在川崎市的中小学课堂上，会安排做一些关于川崎前锋的答题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孩子们对川崎前锋的认知度。当时川崎前锋的主场也不在市中心，那么如何让更多的观众来观赛？经过调研，他们发现老人喜欢打乒乓球，就在这种附近安排了很多乒乓球桌，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川崎前锋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全面支持川崎市提高市民身体素质等等。因此，历任川崎市长都觉得如果不支持川崎前锋就是川崎市民的损失，可以说川崎前锋是俱乐部和地方发展良好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记：您能否给今天的J联赛和B联赛打几分？

川渊：回顾J联赛和B联赛的发展过程，我想说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J联赛不用说，B联赛也很好看了，包括渡边雄太、八村塁等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日本足球、篮球都在不断涌现现在世界舞台上活

跃的球员。现在，日本在世界舞台上非常活跃的恐怕也只有体育了。

记：中国正在推动三大球振兴。您现在担任日本顶级联赛协作机构主席，如何看待振兴三大球的问题？

川渊：日本的球类运动一直不太强。振兴球类运动，是日本顶级联赛协作机构建立的初衷。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巴黎奥运会上，日本终于有10个球类项目（其中七项为集体球类项目）获得参赛资格，三大球男女六个队都取得资格，这是首次。但是，在项目的组织、管理能力上，比起足球、篮球，其他的球类运动还比较弱，这是我们今后面临的最大课题。通过职业化，足球和篮球在财务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他项目也应该要做出同样的努力。如果都实现职业化，日本体育的整体水平会得到整体提升。但像曲棍球、手球等等，要实现职业化还是非常难的，在这些方面我们一直在进行讨论和研究。现在排球和橄榄球处在准职业化、半职业化的阶段，接下来就是手球，我们想推动它的职业化。

记：在带动其他球类项目的发展方面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川渊：比如我们会在一些比赛的赛场分发其他项目赛事的宣传单，互相扩大观众面。又如比，室内足球和篮球项目可以共用一个体育馆。我们把室内足球移到足球和篮球的主场，以此扩大室内足球的参与人数。

不过，要想振兴三大球，最主要还是要依靠各个职业俱乐部扩大自己的基础，让草根阶层真正喜欢体育、参加体育，这可能是中国比较欠缺的地方。比如，在日本高中阶段足球有很多联赛，最主要的两大联赛中有一个只有强队参加的联赛。我们会在普及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加这样切磋提高的机会，然后从中选出优秀的苗子。中国好像缺乏这样通过赛事不断筛选的方式，似乎是从很早就遴选出精英苗子，再来培养，我觉得这是不行的。怎样来培养草根阶层参加体育运动呢？比如在日本，12岁以下的足球比赛采用8人制，尽量降低组队比赛的难度，尽量多办比赛，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更多体会踢球的乐趣，不断在这个过程中去挑选苗子。

另外，以日本足球环境的改变为例，场地建设非常重要。比起我刚做足协主席的时候，日本足球环境最大的改变是专用足球草坪和专业足球场的数量增加了很多。现在，日本专用的足球体育场有近30个，而在J联赛刚成立的时候日本只有4个专用的足球场。那时，专用足球场的规模只能容纳15000人左右，现在都可以容纳3至4万人。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春季慢性呼吸疾病易发 基层防治是关键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春季气温回升，昼夜温差大，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也进入易发期。专家表示，需加速推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早筛早诊工作，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着力增强基层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以更好地适应春季疾病流行的特点。

据了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较为常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病患病率达13.7%，该疾病具有高患病率、高死亡率、高疾病负担的“三高”特点。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教授杨汀介绍，慢阻肺病在业内有“沉默的杀手”之称，患者早期症状不明显，等出现气短或呼吸困难到医院就诊时，往往到了中晚期，加上如果治疗不规范，易引发严重后果。

“肺功能检查是慢阻肺病诊断、病情评估、随访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迟春花说，要在基层医疗机构继续加强慢阻肺病的诊断、治疗及肺功能检查与结果判读的培训，完善肺功能检测仪等常见呼吸系统疾病检测仪器的配备。

目前，对于慢阻肺病、哮喘等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基层医疗机构人员配备不足、检测能力欠缺，易出现漏诊、误诊情况。迟春花表示，需规范化培养全科医生，鼓励全科医生到三甲医院进修至少三个月，全面提高全科医生对慢阻肺病的诊治能力。同时还要鼓励在社区开设慢阻肺病的专病门诊。

专家表示，慢阻肺病、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早筛早诊早治、医疗资源下沉、创新药物可及性提升以及“共病共治共管”模式的探索，有望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专家提醒要警惕伪装成“红眼病”的潜在致盲“杀手”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栗雅婷

入春后往往是“红眼病”的高发期。天津泰达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万红提醒，出现眼红、眼痛时，并非一定就是“红眼病”，要警惕是否由葡萄膜炎引起，并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张万红介绍，葡萄膜炎指的是一大类发生在眼部葡萄膜和视网膜的炎症性疾病。眼球的葡萄膜组织分为三部分，虹膜、睫状体和脉络膜。“大家最常听到的虹膜炎和虹膜睫状体炎，就是指发生在虹膜和睫状体部位的炎症，在葡萄膜的前部，属于前葡萄膜炎。此外，还有中间葡萄膜炎、后葡萄膜炎和全葡萄膜炎。”

她分析，除了一部分是感染、外伤导致外，多数葡萄膜炎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往往缺乏明确的病因，但有时会伴发全身的风湿免疫病。

眼红、眼痛是葡萄膜炎的常见表现。有患者会出现严重的眼痛，有时夜间更为严重，难以入眠。但也有些特殊的类型，如部分少年儿童的慢性虹膜炎，即便病情已经很严重，也可能不出现任何眼红、眼痛的症状。

葡萄膜炎会引起眼前黑影、视力下降，严重者甚至会失明。除了眼睛不舒服，还有患者可能会有有一些全身症状，如身上关节疼、头痛、脖子僵硬、腰部僵硬、耳鸣等。出现这些症状均需引起警惕，必要时可到风湿免疫内科就诊，排除全身疾病。

张万红说，即便患病后也不用太过担心，目前临床上有多种治疗手段，包括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

“葡萄膜炎患者身体锻炼需适度，身体过度疲劳会影响体内免疫平衡。”张万红建议，患病后应充分休息，减少工作量，保持作息规律。同时，精神放松和良好情绪是对付葡萄膜炎的天然良药，患者应去除恐惧和焦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早日恢复健康。

（新华社天津3月12日电）

我国科学家计划打造“数字肾脏” 让肾脏疾病“清晰可见”

新华社记者 阳娜 魏梦佳

北京大学科研团队日前在国际上发布一项“肾脏成像组计划”，拟通过多模态成像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率先构建全肾脏数字图谱。据悉，这一“数字肾脏”能使肾脏疾病机理更“清晰可见”，为肾脏疾病的精准诊断、新药研发、精准治疗提供全新方向。

慢性肾脏病严重影响生命健康。由于病征不明显、检测手段相对单一等，慢性肾脏病患者通常难以在患病早期确诊，一旦出现症状通常已进入病中晚期。

为攻克此难题，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共同发起“肾脏成像组计划”，以期突破传统病理检测局限，以“数字肾脏”为精准诊疗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

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莉说，“数字肾脏”的特点是动态仿真且多维可视，“通过多种技术手段，让肾脏从分子细胞水平到整个器官运行都直观可见，并整合多模态成像，绘出真实肾脏的内部结构和动态演化过程。”

杨莉介绍，在临床上，“数字肾脏”平台也可帮助精准定位病灶根源，并结合患者临床数据构建个性化数字模型，为患者筛选最优治疗方案，从而提升肾脏疾病早期诊断能力和个性化诊疗水平。

根据计划，科研团队将在3年内先构建动物的“数字肾脏”，10年内实现人类“数字肾脏”，并在临床肾脏病诊疗过程中应用。目前，联合团队已绘制完成超声、核磁共振、CT和病理等模态下的成像数据图，并对各模态成像数据进行整合。

“肾脏成像组计划”近日发表于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和平认为，该计划作为国家成像中心首批重大项目之一，不仅为肾脏病研究开辟了新路径，还将为其他器官的数字建模提供重要参考。（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从零工驿站看“灵活就业”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李亚楠

初春，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在西安市半坡立交下，已经聚拢了不少辛勤“趴活”的人，这里是西安市东郊最大的零工“马路市场”，高峰时每天有上千人来这里找日结工、短期工。

零工，是近些年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and 稳就业中产生的“热词”。随着城市变迁和人员流动加快，很多进城人员加入灵活就业的行列，零工经济成为城市民生重要“窗口”。

“趴活”的人群外，黄雪莹披着印有“零工驿站”字样的绶带，一手拿着传单，一手打开喇叭高喊道：“找工作的兄弟姐妹们，50米外有个零工驿站，里边有暖气、热水，有很多工作岗位，可以介绍长期稳定工作，并提供法律咨询，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啊！”

“真的介绍工作吗？”“没手艺也行吗？”话音刚落，众人便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道。黄雪莹将手上就业帮扶政策、招工信息的传单塞进他们手里，耐心地引导解释。

日光渐盛，人员渐少，黄雪莹回到灞桥区零工驿站。门口的招工信息栏已经及时更换，驿站里的求职者正在寻求“就业指导”。

驿站前台设立了登记处。“所有来求职和咨询的人，我们会记录下他们的基本信息和求职意向，后续会持续给他们推荐合适岗位并回访。”黄雪莹指着驿站一角的招聘海报介绍道，“这些是由驿站代为长期招聘的公司，有家政、物流等企业，有意向的可以当场面试。”

47岁的张瑞去年5月失业，家里一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还要供养两个上中学的孩子。他在求职时屡屡碰壁，只能每天到马路市场“碰碰运气”，因为性格内向，虽然有电工证，但过了两周也没找到一份工。

“当时碰到了驿站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我的意向后推荐我参加了零工市集，帮我对接到了一家酒店，培训15天后就正式上岗了，每月能拿近5000元。这份工作我很满意，所以专程过来送面锦旗表达谢意。”张瑞高兴地说。

这样的故事，自2023年12月零工驿站运行以来不断上演着。“驿站主要服务‘灵活就业’需求人员，包括城市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及零工群体。运营至今，已经帮208名求职者找到长期稳定工作。”灞桥区委人社局副局长周美妮说。

临近中午，在16公里外的浐灞国际港零工驿站，工作人员王晶带着整理好的企业招聘信息，前往辖区内的占家村。

同一时间，浐灞国际港辖区居民的各种微信群

里，“占家村村委会里要开招聘会，有意向速来”的消息被广而告之，不断有周边乡镇的村民赶来。

下午两点，一场程序简单的招聘会正式开始。

“我今年50岁，现在在一家物流园干装卸工，想找个离家更近的工作。”南郑村村民崔建设说，“刚看到有企业招办公室文职，我给儿子也投了份简历，开进村里的招聘会就是方便。”

在众多年龄偏大的求职者中，记者发现一张年轻的脸庞。“我是学消防工程的，之前在兰州实习，本来可以留下来，但我是独生女，想回到父母身边工作，在驿站工作人员的推荐下，目前和三家有意向的企业接上了头。”22岁的余明星说。

记者注意到，参会的企业拥有一些共同点：常年招工、对年龄限制较为宽松，物流、后勤、家政等服务类企业较多。浐灞国际港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孙春宁说：“我们会提前收集辖区居民的求职意向，筛选出满足需求的部分企业，不能参会的由我们代为招聘，对接需求。”

不仅在村委会，浐灞国际港将这样小而精的招聘会开到了商场、社区，甚至带求职者走进企业现场试岗，精准对接不同类型求职者的需求，人岗匹配率大大提高。自2023年5月运营以来，零工驿站已经帮1079位求职者顺利就业。

作为零工驿站的工作人员，王晶还要对接辖区内的企业，广泛收集岗位，同时将这些招工信息尽可能多地覆盖辖区群众，她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微信群已有18个。“为了对接需求，我们把用工‘探头’前置。如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陆港院区，我们在其开工建设阶段就开始对接服务。现在我们已常态化为医院输送后勤服务人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陕西省去年发布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清单，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两种缴纳养老保险的方式，并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

据统计，西安市2023年常住人口1307.82万人，比十年前增加约371万人。“灵活就业”市场发展迅速。目前，西安市已建有零工市场、零工驿站以及就业服务站529个。

“我们的初衷就是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指导、信息发布、岗位推荐、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服务，为求职者提供一个家门口的暖心‘信息库’‘歇脚地’和‘加油站’，同时致力于成为他们维护权益的‘娘家人’。”孙春宁说。

（新华社西安2月19日电）



新华社发 崔晓琪 作